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唐宝林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讲话中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因为是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战友又及时报道形势，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说“他(陈独秀——引者)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这才成立了党。”①

在这里，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内容上，也不局限

①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以把 1915—1921 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 1919 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 1919 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延续到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国人民在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政治觉悟之高、规模之大、战斗力之强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 1840 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从 1840—1914 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彷徨和悲观。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

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要用西方文化来补充，从而正式开创了对外开放、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大量翻译和引进外国科学知识书籍、开办新式学校、引进外国管理和科技人才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先河。

后来，在康、梁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如谭嗣同用民本思想批判三纲之说，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他甚至说这个纲常伦理的实质是“独夫民贼”的理论基础：“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① 严复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论点出发，抨击秦以来的一切君主是一群窃国大盗！他在向中国介绍“西学”时用的对比方法，也对后来的陈独秀发生重大的影响，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②

维新派对中国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在群众中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了资产阶级的启蒙作用，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求救亡之道

① 《仁学》卷下，《谭嗣同全集》，第 54、66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的积极性，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和年轻的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孙中山在 1894 年曾上书李鸿章，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改革教育制度以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农工商业。陈独秀也在 1897 年 19 岁时，读维新派的《时务报》，与安徽维新派人士来往，与乡里瞀儒进行辩论，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① 并自撰自印《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廷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侮。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② 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封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说不上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潮流”；“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 1903 年开始；‘才真正出现。’”③ 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④

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独秀在 1904 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1903 年和 1914 年与章士钊合办的《国民日报》和《甲寅杂志》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 1901 年留学日本后也转变为革命派，并在次年冬，与后来成为同盟会和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 2 卷第 4 号。

② 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 年第 5 期。

③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 118 页，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④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 123 页。

民党骨干的一批人建立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 年，他又参与发起了东京、上海的拒俄运动，并到安徽独立发起这个运动，以为响应。这个运动被镇压后，他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①]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陈独秀曾反省自己直到 1901 年 23 岁时在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下,才开始考虑国家问题“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②]

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① 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 17 期。“三爱”是当时陈独秀的笔名。

②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 5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关键词作为切入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在这年秋天，陈因为忙于成立“岳王会”组织和训练江淮地区的革命党人，在《安徽俗话报》出至 22 期后，不得不停刊。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 年有案可查的有 15 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后，这些人也像陈独秀那样被卷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么，这个现象可以视为“革命压倒了启蒙”实际上是‘思想启蒙让位于政治革命’更确切些。

按照陈万雄先生的研究，“反传统的文化革命潮流”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一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这股反传统的“激进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当时国民甚至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多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二是这股文化革新潮流对政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又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三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这股‘潮流’是不是‘断流”了？

看来,这股‘潮流’(包括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

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这股文化革新潮流，也不能高估它的启蒙作用。此其一。

其二，这股文化革命新潮流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① 从参加革命者的思想状况，最能说明当时文化革新潮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章炳麟虽然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但在文化思想上却是个复古派，甚至在他主编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上,还宣称“: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返古复始,人心所同。②

其三，辛亥革命失败后，在袁世凯复辟派的镇压下,这股文化革新潮流‘断流’了。

首先，为了配合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运动，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 1912 年下半年开始，各地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掀起一股尊孔崇儒恶浪。于是， 1913 年 10 月,袁世凯政府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第十九条正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1 月又正式发布尊崇和祭祀孔子的命令：“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大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③ 1914年，袁政府又规定；

①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 4期。

②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第 8 号

③ 《政府公报》,1913年 11月 27 日。

“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用”；“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这就把1912年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规定的“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革新措施取消了。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和权利。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暴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何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4年陈独秀在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反袁杂志《甲寅》时，首次以‘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① 一文，批判传统的国家观，指出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即没有建立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奔波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总结，反映了无出路的苦闷，但同时也标志着对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首先不是还在热烈争论的‘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上的选择，而是提高国民的“自觉心”。怎样提高？一时还没有考虑

① 《甲寅》，第1卷第4号。

成熟。但是由于文章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国家的心情，采用了以上“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如他所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所以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当时就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是为论。”①

章士钊请陈独秀在刊物上回答这些责难时，陈拒绝。但是，当数月之后，章发表文章为陈辩护时，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 21 条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爱国心“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梁启超就是一个。他说：如今“举国人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为敢质言耳！”② 李大钊说：有一友人，初批陈文“伤感过甚”而不以为然，后经燕京之行，再“悟其(陈独秀)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所以，章士钊盛赞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③

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终于找到了中国救亡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要进行一场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④ 所以，陈独秀当时对至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

① 转引自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 1 卷第 6 号。
② 转引自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 1 卷第 6 号。
③ 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 1 卷第 6 号。
④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集》，第 29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思想都全改观。’① 这大概就是他次年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萌芽了。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和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论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即伦理革命上,指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 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

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是：政治上是封建独裁政治体制，支撑它的支柱是小

①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据郑说 陈独秀此话是对其好友汪孟邹说的。汪又告诉了郑。汪在《亚东简史》中则回忆说：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5 号。

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儒家伦理思想（包括“文以载道”宣教这个思想的旧文学、灌输这个思想并教育青年只知个人升官发财的旧教育、教人不抗争、迷信鬼神、认天命的佛教和退让的老庄哲学等旧文化），还有时想灭亡中国遭到抵制后支持并通过中国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只触动政治体制而未动摇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新文化运动把主要攻击集中于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统治下沉睡的广大民众唤醒，人人成为有独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自然具有空前伟大的意义，同时，这次还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来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所以，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

正因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启蒙与救亡是统一的，所以在他批判旧文化的文字中，处处从当时中国的危亡形势出发的，紧扣救亡主题。

如强调改造国民性重要时，他说：“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之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

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6 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无时不在灭亡这数，其亡自亡，其灭自灭也。”①

批判独尊儒术时，他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②

对于宗教迷信和老、庄的苟安忍辱哲学，他认为是造成中国国民性腐败堕落的最大原因之一，所以对它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说：“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③又说“：老尚雌退，儒尚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 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不可得也！”④“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⑤

对于旧文学，陈独秀认为它“遵循‘文以载道’的宗旨，宣教封建思想道德。而所用文言文、八股文完全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老百姓的生活实际”：此种文学，盖

①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 2 卷第 2 号。
②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 2卷第 5号。
③ 陈独秀：《答李大槐》，《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3 号。
④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3号。
⑤ 陈独秀：《答李亨嘉》，《新青年》，第 3卷第 3号。

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① 为此，陈独秀等人认为，为了传播民主主义思想，改造国民性，必须改革这种旧文学，宣称：“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②

对于旧教育，他认为只能培养出“东亚病夫”式的青年，无法与西方入侵者抗衡。他痛切地叹息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痛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③

这些文化革命运动，起先是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发起，1917 年 1 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后，得到支持，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得以吸收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鲁迅、陶孟和、高一涵、王抚五等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组成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新文化阵营（鲁迅当时虽未在北大任职，但与北大同人关系密切），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 。

② 同上。

③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号。

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因为：

第一，新文化运动干将和这些被《新青年》唤醒的青年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以上攻击时，必然引起反弹。封建保守势力自知无理，采用极不光明的手段，或唆使军阀政客用政府力量进行镇压和迫害，甚至在国会中提出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的提案，要求把陈独秀等人驱逐出北大……所有这些，激起新文化战士和广大青年更加昂扬的斗志，并把文化运动转为政治斗争。如陈独秀在回答攻击时所表示：为了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第二，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 年不谈政治”的。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即从陈独秀当初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来看，虽然直接的目标是争民主，争人权；长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对于这个新社会当时陈独秀是这样设想的：“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①]）但正如上述，他认为个人的人格和人权的获得，与国家的独立富强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到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者就不能不谈。再者，新文化运动是针对国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关心个人前途，不关心国家命运即不关心政治的劣根性而发的，因此当发生国家危急形势时，怎能不予关心。陈独秀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

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 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争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

从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

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他的特点是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支持者、保护者。

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到北京，聘为教授，还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为阵地，组织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到全国，收到了扭转中国历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

①陈独秀：《答顾克刚》，《新青年》，第 3卷第 5号。

②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 5 卷第 1期。

和措施,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那样的影响。同时,蔡元培本人也有类似陈独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之责。1919 年 3 月 18 日,曾给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

对于学生,虽然他认为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他不像胡适那样固执,而主张二十岁或二十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团 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选择。他还鼓励学生自治,组织各种社团。虽然这些社团开始是带有学术、娱乐和服务性质的(如学生会、新潮社等),但一旦组织起来,在政治运动中,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组织或带上政治色彩。所以,何思源回忆说:5 月 2 日,蔡元培首先得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后,就"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① 叶景莘也说:"三日……傍晚我到汪(即国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引者)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

①许德珩:《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67 页。

……’① 许德珩回忆说：“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② 于是便有了五三大会、五四游行。

从这三位亲历者的回忆，说蔡元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并不为过。而且紧接着蔡元培又为营救在五四中被捕的学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陈独秀在 1940 年 3 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③

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适而不提李大钊，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李是陈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直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思想上行动上完全一致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 3 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钊留在北大直接指导学生行动。早在“五三”之前，甚至是 4月底，经常同李大钊接触的学生就开始讨论“直接行动”的问题，所以，5 月 1 日李发表的《五一节 May Day 杂感》短文就强调指出：“五一节是世界工人的唯

①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 1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第 51 页。

③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 年 3 月 24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